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汤普森(Thompson,E.P.)
著,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SBN 7-80657-169-8

I.英... II.①汤... ②钱... III.工人阶级-研究-英国
IV.D756.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5614号

Copyright © 1963 by Edward Palmer Thompso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tor Gollancz (Cassell Gp.)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44号

书 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作 者 [英国]E.P.汤普森
译 者 钱乘旦 杨 豫 潘兴明 何高藻
责任编辑 胡传胜 刘金源 周丽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6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2.75
插 页 4
字 数 750千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001—10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169-8/I·147
定 价 (上下两册)54.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册)

前 言.....	(1)
----------	-------

第一部 自由之树

第一章 成员无数.....	(3)
第二章 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13)
第三章 “魔鬼之窟”.....	(47)
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73)
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	(102)

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第六章 剥 削.....	(205)
第七章 农业工人.....	(233)
第八章 工匠及其他.....	(260)
第九章 织 工.....	(303)
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经历.....	(361)
1. 生活品	(361)
2. 住 家	(366)
3. 生 活	(371)
4. 儿 童	(381)
第十一章 十字架的转换力.....	(404)
1. 道德机器	(404)
2. 绝望中的千年至福	(434)

第十二章 社 会	(469)
1. 闲暇与人际关系	(469)
2. 互助之风	(489)
3. 爱尔兰人	(503)
4. 永世万代	(521)

目 录

(下册)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529)
第十四章 替天行道	(555)
1. 黑灯照	(555)
2. 无形之影	(569)
3. 反结社立法	(583)
4. 剪绒工和织袜工	(611)
5. 绿林好汉	(645)
6. 奉行业之命	(671)
第十五章 蛊惑家和殉难者	(703)
1. 心怀不满	(703)
2. 领导权问题	(708)
3. 汉普登俱乐部	(737)
4. 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	(758)
5. 彼得卢	(783)
6. 卡图街密谋	(821)
第十六章 阶级意识	(835)
1. 激进文化	(835)
2. 威廉·科贝特	(878)
3. 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	(898)

4. 欧文主义	(918)
5. 一种机器	(951)
参考书说明	(983)
鸣 谢	(988)
E. P. 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989)
索 引	(1007)

前 言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

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

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①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

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②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

^① 持这种观点而又与本书所述时期相关的一个例子,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 N. J. 斯梅尔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1959)。

^② R. 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第 148—149 页。

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至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18世纪90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

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

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19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S.G.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

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

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 J. 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 P. 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 西格斯沃思博士和 H. O. E. 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茜·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

1963 年 8 月,于哈里法克斯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革命开始了，
回家去拿枪，
瞄准威灵顿公爵 射。”

——贝尔珀的街头歌谣

“人民不愿……为追求光辉的戏剧效果而选择叛乱。”

——威廉·黑兹利特

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451

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

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① 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 G. 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1797至1802年间,福克斯大概

^① 当时最妙的一个讽刺就是1800年霍恩·图克作为最衰败的选邑老萨勒姆的议员当选,但他因有关的规定的原因而丧失资格,因为他以前担任过教会牧师。

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②

452 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③

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旅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狐犬和马,还

^② 人民一分子:《致在天使酒店聚会……庆祝C.F.福克斯生日的该协会的第三十六封信》(诺里季,1799)。

^③ 见下文,第472—484页。

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

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④ 453

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已经虚弱

^④ J. 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表明雅各宾主义在进展》(1802),第3—4页;《魄力的好效率》(1804),第141页。改革派愤怒驳斥鲍尔斯的裸体女士的说法,斥其为谎言,见《关于诺丁汉上次竞选的十封信》(诺丁汉,1803),第24—25页;萨顿:《诺丁汉纪实》,第244页。真实情况或许是关于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妇女“穿着肉色的衣服”,见《致约翰·鲍尔斯》(诺丁汉,1803),第9页。

不堪，“形容枯槁”，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

从皮卡迪利到设在布伦特福德的投票点，一片混乱和煽动暴乱的景象实属前所未见，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区。……一路上……从圣贾尔斯教堂起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痞子，咆哮着“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在投票点，每天都有五、六个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骂去反对梅因沃林先生当选并以此逗引乌合之众的高兴。

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
454 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⑤

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

^⑤ 当选者宾（辉格党）3843票，伯德特（激进派）3207票，未当选者梅因沃林（托利党）2936票。见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2年7月10、17、24日；J. G. 阿尔杰：《拿破仑的英国客人和俘虏》（1904）；J. 德尚：《法国大革命时的英国下腹部》（布鲁塞尔，1949），第5章；M. W. 帕特森：《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931），第4、7章。